

双向开放与发展系列



The Exploration from IFDI to OFDI

The Construction Basis of Dynamic IDP Theory

从IFDI到 OFDI的探索

——动态IDP理论的建构基础

陈涛涛 等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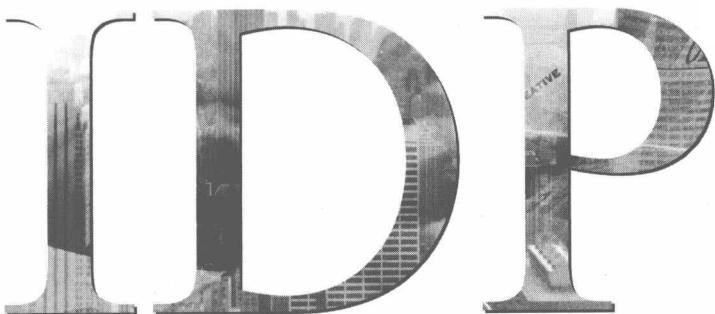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列



The Exploration from IFDI to OFDI

The Construction Basis of Dynamic IDP Theory

从IFDI到 OFDI的探索

——动态IDP理论的建构基础

陈涛涛 等 /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 IFDI 到 OFDI 的探索：动态 IDP 理论的建构基础 /
陈涛涛等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 12
(双向开放与发展系列)
ISBN 978 - 7 - 5141 - 8724 - 3

I . ①从… II . ①陈… III . ①外资利用 - 研究 - 中国
②对外投资 - 研究 - 中国 IV . ①F832.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1515 号

责任编辑：侯晓霞

责任校对：隗立娜

责任印制：李 鹏

从 IFDI 到 OFDI 的探索

——动态 IDP 理论的建构基础

陈涛涛 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教材分社电话：010 - 88191343 发行部电话：010 - 88191522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houxiaoxia@esp.com.cn

天猫网店：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26 印张 400000 字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8724 - 3 定价：6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 881915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dbts@esp.com.cn)

本项目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博士点基金的支持

自序

“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是对外开放的两个方向。纵观世界，迄今为止鲜有国家从宏观上对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进行逻辑一致的管理和控制；也鲜有学者对其内在的对立统一关系进行深入的探究。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的高效配置。”这一表述反映出我国已进入了要对“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双向开放政策进行统一筹划和管理的新阶段。

然而，经过了9年时间的艰苦探索，我们深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从“吸引外资”到“对外投资”这一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经济学及管理学大师邓宁（John H. Dunning）提出了投资发展路径理论（下称IDP理论），并指出一国的对外净投资（对外投资减吸引外资的差）将随本国的经济发展而经历由负转正的发展过程（Dunning, 1981）。但遗憾的是，该理论一直未能充分解释其中的内在机制，因而该理论目前尚不能对当今实施开放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有效的指导。由此，在过去的9年时间里，我和我所带领的博士生团队一直在该领域不懈地耕耘，从理论连续性的角度，我们将倾心探索的“发展中国家从吸引外资到对外投资的动态发展过程”称之为“动态IDP理论”。2017年11月我们第一部关于动态IDP理论的论著《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作用机制——动态IDP理论的初步构建》已经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

经过这 9 年的探索，我能深刻地体会到发展中世界对这一领域发展经验和理论归结的迫切需要。从我国近 40 年的发展经历来看，从 1978 年改革开放吸引外资到 2016 年我国的对外投资高居全球第二位，且同年对外投资超过吸引外资成为了对外净投资国，使 20 世纪 80 年代的“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终于有了在现实世界的实践范本！然而，在研究中我们也同时发现，一方面，早期的追赶型国家日本和韩国，曾经因为害怕强势外资的引入会影响本国企业的发展而“限制外资的进入”，同时代之以“引进技术”的开放方式，最终成就了当今世界不少强大的日、韩跨国企业；另一方面，一些拉美国家在自身债务危机以及“华盛顿共识”的双重压力下采取了激进式的开放策略，结果使其本土企业大部分被外资挤出，无缘成为当今全球化世界中实施跨国投资的佼佼者。事实上，上述这些国家在开放发展中的实践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对这些实践深层动态逻辑的挖掘，可以为当今世界大量采取开放式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特别有价值的经验；而对于这些经验的深入探讨，也会为志在发展中国家开放与发展领域研究及理论探索的学者们提供扎实的实践基础。

在介绍了“动态 IDP”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及其理论及实践背景的基础上，为了使更多的我国学者和发展中国家学者与我们共同努力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我认为有必要清晰地解释这一领域的研究方面、路径和挑战。由此，在本论文集中，将我们在这 9 年中不断探讨且陆续发表的相关论文在这里呈现给大家。该论文集中的论文分为了三个部分，它们分别是“外商直接投资（IFDI）溢出效应”“对外投资（OFDI）的环境与能力”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IFDI）对对外投资（OFDI）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不难理解，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吸引外资是实施开放发展战略的起点，因而，对“吸引外资对本国产业和企业的影响的研究”也是动态 IDP 理论的研究起点。事实上，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哈佛商学院的 Richard Caves 教授就提出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FDI spillover）理论，并且后来，外资溢出效应理论也成了在开放与发展领域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受到了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广为关注。我在 2000 年被清华大学派往 MIT 做访问学者时发现这个领域对我国的开放大业具有重要价值，因而开始了在这一领域的不断耕耘。本论文集中关于 FDI 溢出效应的 8 篇文章，正是

我们在这一领域探索的结果。事实上，由于早期该领域包括哈佛商学院的 Rechard Caves 教授、斯德哥尔摩大学的 Magnus Blomstrom 教授、Ari Kokko 教授等人搭建了相应的研究模型，加之我在 MIT 期间又有 Lester Thurow 教授、Donald Lessard 教授、Alice Amsden 教授、Ernst Berndt 等教授可以请教，特别是 Donald Lessard 教授还介绍我两次直接到哈佛商学院拜访了 Rechard Caves 教授本人，所以开始时这个方面的研究进展得比较顺利；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逐步发现，我利用模型所得到的结果越来越难于用国际上已经得到的理论加以解释，这一情况使我不得不向中国的开放实践寻求真实的答案。从那时起，我带领我的学生开始了对我国通讯制造、电视机制造、微波炉制造、零售等行业以及其中的典型企业展开了系列调研。正是这些扎实的调研活动，为我解开了一个又一个的谜团；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搭建更符合实际的检验模型增添了适当的解释变量。这也是本论文集中外资溢出效应部分的论文既包括实证检验性文章，也包括案例研究性文章的原因。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为我国的海外投资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虽然在此前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 2008 年及其之后的年份，我国的海外投资呈现出了明显“跳升”以及相对快速的增长。然而，早期的海外投资很快遇到了挫折，同时也遭遇了国际世界的普遍质疑。无论是在实践领域还是学术领域，对我国海外投资的最大质疑即是我国企业的投资能力。世界普遍认为，我国从事海外投资的企业是以国有企业为主，而国有企业的投资能力主要源自国家资本的支持。这一普遍质疑在现实中也直接挑战了我国涉及国际投资的政府管理部门，当时我直接接到政府部门的研究邀请，于是从研究伊始就开展了对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海外实地调研。相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我国对外投资开展时间要短很多，从一开始就没有翔实的数据可以依赖；通过对我国海外投资企业的真实调研，一方面我们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真实环境有了真切的体会；另一方面，我们对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在特定东道国环境下的实际投资和运作能力有了切实的理解。依据上述扎实的海外实地调研基础，结合国际投资理论，使我们一方面有能力更加准确地描述我国企业的能力水平并解析这些能力优势和劣势的起源；另一方面也解答了相关管理部门的疑问并为之提供了有效的政策

性建议。在本论文集的第二个部分，我们收集了在此过程中形成的 7 篇论文。

由于在上述两个领域的耕耘，特别是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能力的探索，自然地推动了我们将对外投资企业的能力来源问题与我国的开放发展过程相联系，这也就自然地引发了我们对“开放吸引外资对我国对外投资能力建设的影响”的联想和探讨。事实上，我们对“我国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影响的研究”几乎是与我们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能力及其来源”的研究是同步开展的；特别是在我们开展海外投资调研、参与各种国际会议的过程中，我们深刻体会到，开放与发展的问题是当今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问题，并且在全球化迅速扩展的几十年中，不同的追赶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开放与发展的道路都有不同的尝试，因此，对于这一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国际比较研究是特别重要的。为此，我们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专门邀请了英国瑞丁（Reading）大学邓宁中心主任纳如拉（Rajneesh Narula）教授（也是 IDP 的创始人之一）来清华大学访问，同时也与巴西顶级商学院 FGV 的院长 Maria Tereza Leme Fleury 教授和圣保罗大学的 Afonso Fleury 教授等海外学者展开了合作研究。在论文的第三部分，我们与大家分享了在动态 IDP 理论探索过程中的 9 篇论文。

事实上，上述三个领域，无论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对外投资的环境与能力”还是“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动态作用机制”（即动态 IDP 理论），都分别是一个宽泛而复杂的研究领域，而我们在每个领域中的尝试也都仍是“现在进行时”，已发表的文章中也有很多缺憾，我们对当前的研究缺憾和挑战有充分的认知。然而，当前世界风云变幻，危机后全球化形势也愈加复杂，我们发展中国家自身的道路，需要我们自己付出努力进行脚踏实地的探索，仅仅依靠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或通过当前不充分的数据所支持的模型研究来探索开放与发展之路，显然既不可能，也不现实。所以，我们将上述正在进行中的研究及其阶段性的成果与大家分享，正是期待着与中外同行携手并肩，为我们共同的事业做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在此，我要感谢我的学生们，他们在跟我学习期间，以他们年轻而充满活力青春岁月投身于这项复杂的研究，而且对研究工作充满了诚意且一

丝不苟。他们是陈晓、宋爽、陈忱、顾凌骏、柳士昌、徐润、金莹、吴敏、范明曦、马文祥和陈娇等；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博士生柳士昌同学，他因为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领域研究的执着追求来到我的身边，几年来从吸引外资到对外投资、再到动态 IDP 的研究，一直在辛勤地耕耘，并且为此论文集的组织和编辑工作付出了辛苦的努力；此外，我也要感谢我的助理张冉小姐，该本论文集的问世也离不开她的鼎力支持和有效工作。

陈涛涛

2017 年 11 月于清华园

目录



第一部分 外商直接投资（IFDI）溢出效应

影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行业特征 / 3	
对影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内外溢效应的因素的经验研究 / 18	
中国 FDI 行业内溢效应的内在机制研究 / 33	
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与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 / 48	
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内溢出效应的政策要素研究 / 64	
构建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内溢出效应双机制双因素分析模型 / 80	
行业增长因素与中国 FDI 行业内溢出效应 / 95	
中国高端产业中 FDI 行业内溢出效应的规律探索 / 111	

第二部分 对外投资（OFDI）的环境与能力

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竞争的本土优势与跨国经营 / 137	
中国跨国公司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战略选择——以中建投资美国为例 / 158	

- 赢得机遇的关键在于应对国际环境的挑战——基于投资欧洲的实践 / 173
智利：中国企业的投资环境与机会 / 179
哥伦比亚投资环境与中国企业的投资机会 / 194
墨西哥投资环境与中国企业投资机会 / 209
拉美投资环境与中国企业的投资策略 / 227

第三部分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IFDI）对对外 投资（OFDI）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 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的发展与评述 / 247
吸引外资影响对外投资吗？
——基于全球层面数据的研究 / 267
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典型国家的经验检验
——基于中、巴、日、韩四国的数据比较 / 295
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能力影响的机制研究
——以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为例 / 317
外资依赖型产业发展战略：激励与限制
——巴西汽车产业发展研究 / 333
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能力的影响机制
——机制分析框架的初步构建 / 347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研究
——以国际矿产行业为例 / 363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研究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 / 377
透视复杂环境下特定国家的产业发展机会
——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 / 393

第一部分

外商直接投资(IFDI)溢出效应

影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溢出 效应的行业特征^{*}

陈涛涛 陈 娇^{**}

一、引 言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东道国的溢出效应一向是采取对外开放政策的国家所热切期待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国的溢出效应被视为获取跨国企业先进的科学与管理技术的重要渠道之一。然而，溢出效应产生的机制到目前为止尚未有明确的理论框架。这也是为什么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这一研究领域在国际上特别活跃的主要原因。

探索国际上这一研究领域的脉络，我们发现，在众多的对行业内溢出效应的经验研究中，对不同国家的检验呈现出不同的结果。例如，Cave对澳大利亚制造业的研究、Globerman对加拿大制造业的研究、Blomstrom和Persson几次对墨西哥制造业的研究以及Flores Jr.对葡萄牙制造业的研究成果都表明，FDI的溢出效应是明显存在的；然而，Aitken和Harrison两次对委内瑞拉制造业的研究、Haddad和Harrsion对摩洛哥的研究以及2005年Haskel对英国的同类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FDI的溢出效应是不存在的。在探讨上述不同结果的基础上，学者们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溢

* 本文发表于《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略有改动。

** 陈涛涛，女，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娇，女，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

出效应不是自动产生的，东道国的环境以及不同行业特点会对溢出效应的产生发生影响。

对东道国影响 FDI 溢出效应的因素的探讨是该领域研究不断深入的表征。在对影响溢出效益的宏观环境、商业条件等方面的探讨中，对行业特征的探讨尤为热烈。通常被检验的影响要素包括行业的技术特点（如技术水平的高低、内外资技术差距的大小等）、行业的资本密集度、行业集中度以及行业中企业的经济规模等。对于上述行业特征的经验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也比较发散。探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一方面很可能是源于不同国家自身环境与条件的不同；另一方面，也可能尚未准确把握起到关键作用的行业特征本身。

在研究国内外文献以及利用国内制造业的数据进行了可比研究的基础上，我们采用了“新的反映行业特征的”的变量对基本模型进行了检验。我们采用的新的反映行业特征的变量注重于同一行业中内外资企业在竞争能力上的差距。我们的经验研究所把握的内外资的能力差距包括以下三种，即“技术差距”“资本密集度差距”以及“规模差距”。检验结果表明，凡是在内外资企业之间能力差距较小的情况下，溢出效益都是非常明显的；相反，在内外资企业之间能力差距较大的情况下，溢出效益都是不显著的。与国际上的同类研究相比较，我们认为，将行业中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识别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关键特征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本篇文章的结构如下：第一，我们对国内外对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内溢出效应的行业特征的研究进行综述；第二，我们对本项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模型与步骤进行介绍；第三，我们给出经验检验的结果并加以分析；第四，我们给出本文的基本结论和相关的政策启示。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及前期研究成果

1. 基本的研究方法。国际上对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对东道国产生了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判断，是基于把本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或劳动效率与

外商直接投资在行业内的参与程度联系起来所建立的基本计量模型。当反映外商直接投资参与程度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劳动生产率或劳动效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时，就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是存在的。

学者们对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是将被研究的影响因素作为分组变量将总样本分成两组。如果两组反映 FDI 参与程度的变量前系数的估计值相互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表现为 t 检验值的差异时，被研究的因素就被认为是对 FDI 的溢出效应有明显影响的。此外，有些研究将被考量的影响要素与反映 FDI 参与程度的变量相乘构造成连乘变量，从而考察连乘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2. 关于影响 FDI 行业内溢出效应的行业要素的研究成果。迄今为止，受到普遍重视的、被认为可能影响 FDI 行业内溢出效应的行业特征变量主要包括：“技术水平或技术差距”“资本密集程度”“专利的付费水平”“行业集中度”以及“行业中企业的经济规模”等。

对行业的技术水平或行业内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对溢出效应的影响的研究是相对最为丰富的。以 1978 年 Findlay 为代表的早期经验研究以及 1999 年 Sjoholm 对印度尼西亚的经验研究表明，技术差距越大，溢出效应也越大。他们认为，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越大，本地企业越具有追赶和学习的空间，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越快；然而，1996 年 Kokko 对乌拉圭的研究以及 2001 年 Li, Liu 和 Parker 对中国台湾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当外资与内资的技术差距较小的时候，溢出效应才是明显的。特别是，当 1994 年 Kokko 采用连乘变量来检验技术差距对本地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时发现，当外资与内资的技术差距较大时，相应的连乘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是显著负相关的，说明技术差距太大会阻碍溢出效应的产生。得出这一结论的学者认为，东道国本土企业在技术差距小的情况下有能力进行学习和追赶；而当技术差距太大时，一方面外资企业采用的技术可能与本地企业采用的技术完全不相关，所以本地企业无从学习；另一方面，差距太大，本土企业也欠缺相应的学习能力，从而无法进行学习和追赶。此外，1993 年 Haddad 和 Harrson 对摩

洛哥的研究虽然在总样本中 FDI 的溢出效应不显著，但当按照行业的技术水平进行分组时，在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一组，FDI 前系数的估计值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说明在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行业中 FDI 的溢出效应是存在的。

此外，1994 年 Kokko 在对墨西哥的研究中，还采用“专利付费水平”以及“外资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作为企业技术水平的另外两个指标进行了分组。其检验结果是，只有在付费水平低和资本密集度低的组中，FDI 的溢出效应是明显的。

学者们对行业集中度对 FDI 溢出效应的影响的探讨往往与行业内的竞争程度以及行业内企业的规模效应相互联系。例如，1999 年 Sjoholm 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中采用反映行业集中度的指标“Herfindalh”进行分组，其结论是，Herfindalh 较低，行业中企业竞争越激烈，FDI 的溢出效应就越明显。1986 年 Blomstrom 在研究墨西哥企业生产效率的改善时，将反映行业集中度的变量“Herfindahl”指数放在基础方程中作为解释变量之一，检验的结果发现，“Herfindahl”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形成了正相关的关系。这与预先的假设不符，因为，一般认为，行业集中度（Herfindahl）越低，反映竞争更加激烈，从而会促进溢出效应的产生。这时，Blomstrom 援引了 1972 年 Carlsson 在遇到类似状况时的解释办法，即在一个高度保护的、竞争程度不高的市场上，Herfindahl 更多地反映了企业的规模效益，而不是市场力量。因此 Blomstrom 认为检验表明，企业的规模越大，越能实现规模经济，从而也越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1994 年 Kokko 也在基础方程中包含了反映行业集中度的变量“Herfindahl”。在总方程中不显著的“Herfindahl”在采用技术差距分组时呈现了显著的状态。Kokko 对检验结果的解释也援引了 1986 年 Blostrom 的解释方法。

此外，1999 年 Aitken 和 Harrison 在对摩洛哥的研究中采用“行业中的企业规模”对样本进行分组，其结论是，在企业规模小的一组中，FDI 的溢出效应是显著的。

我国在外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方面的研究从 1998 年开始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例如，1998 年，秦晓钟和胡志宝（1998）采用生产函数模型，利用 1995 年工业普查数据，对含采掘业、电力煤气等 39 个行业进行